

经济体制改革

探索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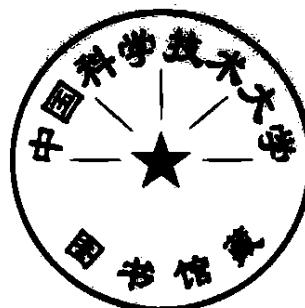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刘怀德

副主任：席与年 任吉麟 叶小文

成员：吴知论 吴妙琳 戴仁信

金正宇 徐萍 高扬



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29千字 2插页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50

书号：4115·121 定价：3.00元

ISBN 7-221-00019-0/F·01

编者的话

本书是研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专集。作者是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其中既有著名的经济学家，亦有近年来活跃于理论界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应中共贵州省委和贵州省人民政府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赴黔智力支边服务团”（北京大学由党委副书记郝斌带队，中国人民大学由研究生院副院长周新城带队）在贵州省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讲学、咨询和考察调研活动，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尤其是他们开设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系列讲座”，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我们收集了讲座的讲稿，请作者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选编了这本专集。

本书较为广泛地涉及了我国改革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展望和基本思路的对比分析，第二部分是对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有制、价格等重大问题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对国外经济改革及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介绍，第四部分是对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问题的探讨。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三个：

第一，针对性强。本书所涉及的大都是近年来改革的前沿课题。作者面对改革现实，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对策性研究。其中一些观点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并且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二，有理论深度。作者没有停留于一般现象的描述和解释，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第三，通俗易懂。本书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避免了过多的抽象论述，即使是理论性较强的论述，也尽可能地做到深入浅出。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全面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需要我们突破那些不适应新情况的僵化观念，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作者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表示：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他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观点和不同的看法，欢迎理论工作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广大的读者提出意见，进一步探索和展开争论，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地发展。

为了将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尽量缩短了本书的编辑时间，加之经验不足，本书存在的缺点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贵州省经济委员会、贵州省教育委员会、共青团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等部门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八月于贵阳

目 录

编者的话

改革的基本思路	厉以宁	(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肖灼基	(14)
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高鸿业	(39)
经济杠杆及其综合运用	胡乃武	(46)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刘方棫	(70)
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91)
所有制改革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李庆云	(123)
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	李庆云	(139)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宏观控制理论		
.....	胡乃武 吴小求	(156)
合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	肖灼基	(182)

我国价格体系改革的基本经验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肖灼基 (193)

生产资料价格改革与生产资料市场.....黄永山 (219)

对物价改革的几点设想.....谢百三 (238)

我国对外金融体制的改革.....李庆云 (254)

把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谢百三 (275)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肖灼基 (290)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城 (308)

发展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陶文达 (371)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张炳九 (398)

经济体制改革与人事管理改革.....吴知论 (422)

经济体制改革中某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吴知论 (436)

改革的基本思路

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好几年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怎样进行，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一共七个问题，二十八点。其中有些看法可能引起争论。这是一件好事，没有争鸣，经济学就不可能繁荣。

一、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

(一) 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

(二) 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真正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真正自负盈亏”主要是指：第一，企业必须负担亏损带来的一切后果。第二，盈亏必须是对称的。这里的“对称”，既对企业而言，也对企业负责人而言。所有制改革中最要紧的，就是真正使全民所有制企业自负盈亏，特别是要解决企业亏损后怎么办的问题。盈亏的对称性是指：盈利的好处归企业，亏损也应由企业承担，不能象现在这样，亏损归国家。这将成为改善企业经营的动

力。有些集资兴办的企业之所以有活力，有动力，有压力，与盈亏的对称性有关。盈了归自己，亏也由自己负责，直到最后倾家荡产。目前在我国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中，企业亏了以后，负责人只是换个工作或受降级的行政处分，这是不管用的。盈亏必须对称。因此，经营不善的企业，该破产的就破产，破产后就清理。要有破产法，还要有社会保障的规定，对工人的就业等问题要认真处理。

(三) 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可以实行股份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可行措施之一也是实行股份制、控股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司财团(企业财团)。

这里所说的股份制，主要不是指把股票卖给职工或个人所有(当然也可卖点给职工、个人)，主要指公有者之间按股取利。公股持有者是多种多样的：国营企业财产评估以后，这一部分股权归国家，等于国家投资在这里。地方增加投资，是地方的股权。企业扩大再生产部分的投资，是企业的股权。其它全民所有制企业进来投资，是其它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权。这样，根据股权的多少，在董事会中有适当的安排。建立董事会后，由董事会来处理这个股份制企业的一切事务。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政企职责分开的问题。不然，政企分开的问题总是不好解决的。必须建立董事会，由股东大会成立董事会。股东都是公方。假定股票可以卖点给私人，那么比重也不会很大。实行控股制，也是全民所有制可以采取的措施。控股制就是：既然实行股份制，既然公司企业的股票可以让大家认购，就可以实行控股制；西方国家中某个大股东掌握公司不到51%的股票，有可能控制这个企业，使之成为子公司。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可以假定：实行控股制后，一个强有力社会主义大企业，通过层层控制，成为社会主义的公司财

团。这个公司财团将能改变企业行为，使企业从只注意短期经营，变为也注意长期经营，因为它具有战略眼光。这时，它能根据今后公司的长期发展，制定决策。作为一个公司财团，要有全盘考虑。比如说，西北的石油开发，可以由公司财团出面搞，它注意到若干年后西北地区石油工业将兴起，就会考虑用一部分利润到西北投资。它可以跨部门、跨地区经营，自己内部可以取得一个平均利润。这样可以大大加速西北的开发。我们将来对西部的开发，不能象现在这样零敲碎打，而可以由社会主义的公司财团来开发、经营。

(四) 所有制改革要因行业、地区、企业规模而异。对于企业，我们可以把各个企业按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按其所需资源的稀缺程度，分成若干个行业。然后看看哪些行业应该发展？主要发展什么样的企业，是全民的、集体的，还是个体的？因地区而异，是指要按各个地区的特点来发展。因企业规模而异，是指企业要按不同大小来分类。假定这样的话，全民所有制企业将保留在重要的行业内，保留在一些地区。它们是较大规模的企业。其它的企业，该租赁的租赁，该承包的承包，少数还可卖给集体或个体。这样，把大部分小企业摆脱，国家则把一些全民所有制的骨干企业保留下，让它们发育为社会主义的公司财团，让它们具有竞争能力，让它们成为中国的跨国公司，打入国际市场。它们都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实现这样一种设想将是我们改革成功的关键。它将给企业带来动力、责任、刺激、利益。还有些中小企业要出卖股权，谁买？卖给谁？要看行业而定。集体、个人都可以买。这就可以形成一种新型的经济联合体：混合企业。这样，我们才能实行真正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形式。这绝不影响全民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和公有制的统治地位。

二、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

(一) 市场本身有一种自行调节的功能，它可以使需求和供给趋向平衡；它又有各种局限性，因此有必要进行政府调节。但绝不能反过来讲：政府能够包办一切，只是由于目前力量不足，才需要由市场来拾遗补缺。我们认为，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首先肯定市场本身有一种机制，能够使经济自动调节，能使供求趋向平衡；但因为它有各种局限性，如资源的有限供给、经济信息系统不健全等等，所以需要政府调节。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社会主义经济首先是商品经济，然后才是有计划发展的商品经济。

(二) 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是并存的、互补的，一方不能替代另一方。这就是二元机制。但二元机制绝非板块结合。它的含义是：政府调节必须以市场调节作为出发点，它是为弥补市场调节的种种局限性而存在的。所以，计划价格必须以市场上形成的各种价格为依据。市场价格是多种多样的，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才有自由价格，在其他条件下，将会形成不完全竞争的价格。而每一种市场都有自由价格与不完全竞争价格之分，计划价格必须以市场上的各种价格为依据。同时，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可以有上下出入。上下出入，在于政府调节，但必须以市场价格作为出发点。

(三) 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不是靠引进的，而是自然发育的。过去，它之所以没有发育或发育不足，是由于缺乏发育的环境，缺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环境。只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机制会自行趋于完善。我在这里使用了“比较完善”这四

个字。市场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应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经济是资源供给有限的经济，而且还要考虑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但我们可以使之“比较完善”。

(四) 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应包括四大市场：1.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房产市场也应包括在内，因为住宅商品化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2. 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在内。企业实行股份制后，假定允许企业买卖股票，假定允许个人购买股票，就应有一个证券市场来进行这样的交易。不然，这种证券将缺乏灵活性。但证券市场可以加以调节，或者存在专门的证券市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由银行代理发行股票、买卖股票、充当股票经纪人和实行股票的抵押、贴现。3. 技术市场。是指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的市场。4. 劳动力非商品化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简称为劳务市场。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从来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因而它是分层次的、因地而异的。由于人员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方面的局限性，它只可能逐渐趋向于完善。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商品市场。这就是说，商品不管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假定它不能流通，那仅仅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如成本太高、收益太低），而绝不是由于经济以外的因素的干扰。资本市场也是指全国范围的资金市场。假定资金不能做到全国范围的融通，这仅仅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不是由于人为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

三、 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

(一) 一个有高度效率的政府部门，表现为有效的经济决策、有效的政策执行、有效的经济监督。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以权代法，是政府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标志。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部门，加上一个不完善的市场机制，那么我们的经济改革，尽管方案再好，也不能实行。所以在改革的思路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必须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

(二) 经济调节比采取行政手段要求有更高的管理水平，间接控制比直接控制要求有更高的管理水平，指导性计划比指令计划要求有更高的管理水平。应该认识到：改革以后，管理经济不是容易了，而是更难了。目前，我们经济管理干部的水平，大大落后于需要。所以要加速培养经济管理干部，提高干部素质。这是提高政府部门效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 与其是主观主义的、不科学的计划管理，不如不要计划管理；与其是无效率、瞎指挥的经济调节，不如不要经济调节。在这种情况下，不如索性让市场调节与商品经济来发挥作用。所以在二元机制中，与市场机制并存的那种政府调节，是指科学的、有高度效率的政府调节。二元机制不是简单地说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都要有。政府调节以具有科学性与高效率为前提。假定我们不要瞎指挥的政府调节，只要市场调节，那么至少可以使经济在波动中增长。而瞎指挥的政府调节的加入，就有可能使经济停滞、倒退，1958年的事例就很典型。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政府调节要有区别，看它是不是科学的。科学的政府调节是好事，它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不科学的政府调节，会使市场调节原有的优越性消失掉。因为市场机制大体上可以使供求趋于平衡，虽然时间和过程要长一些，波动要大一点，但经济还可以增长。所以，把二元机制提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认识，我们的思路就打开了。

(四) 为了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行政改革势在必行。干部选拔、任命制度必须改革。对干部应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以

便加以考核。干部“只上不下”，当然不对。干部“能上能下”的提法，也不一定妥当。应该是干部“有上有下”。该上就上，不该上就下。应该是：干部当得好的，就上，当不好就下。在干部任免上，没有照顾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政府部门就会有效率，从而加速体制改革的进程。

四、企业家精神与社会主义企业家

(一) 中国需要一大批社会主义企业家，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应该有战略眼光，有创新与实干精神，有组织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在经济改革中，要保护社会主义企业家，让他们充分施展才能。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即使改革了所有制，建立了股份制的企业，建立了公司集团，建立了新型的公有制企业，经济仍然缺乏生机。如前所述，所有制改革是关键。现在的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个新型的公有制企业？谁能施展才能来发挥企业的活力？那就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仅仅改革了所有制是不够的。所有制改革的内在的东西，就是企业家精神。我们在改革中要认识到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二) 社会主义企业家不是靠自上而下地指定产生的，也不是靠“温室”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命运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与企业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在竞争的环境中拼搏出来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原来条件不好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那里是容易产生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场所。要找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就应该到那些地方（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去寻找。因为，那里条件差。能够从中拼杀出来的人，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社会主义企业家是环境逼出来的”，这句话对我们很有现实意

义。这样产生的企业家，才能给企业带来竞争力。

(三) 要认识到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越发展，企业家将越多，企业家精神也越能发挥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这将胜过创办多少期厂长训练班、经理培训班。没有商品经济的环境，是培养不出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同样，大学里的经济系，可以使学生增长一些基本经济知识，不一定能培养出企业家。

(四) 企业必须新陈代谢。办得不好的企业，该停产的停产，该关闭的关闭，该淘汰的淘汰，该清理的清理。社会主义经济中每年有百分之几的企业破产，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应该留给那些新兴的、有生命力的、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大显身手。市场竞争是一场旋风。它吹垮了那些落后的、没有效益的企业，保住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企业，但更重要的是：它清理了场地，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生长。这就是创新。这样才能有社会主义的财团，才能有打入国际市场的社会主义跨国公司。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既有压力，更有活力。

五、符合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经济行为规范

(一) 社会不平等引起社会不安定，但社会不安定不一定来自社会不平等。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增加效率，但效率不一定来自收入分配的差距。对一个客观上平等的社会，假定说人们的生活水平先上升，后下降，上升大，下降小，由于消费、收入、工资的不可逆性，也可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是由于人们的心理造成的。另一种情况是：对于一个客观上平等的社会，有些人会自认

为不平等。比如有人多劳多得，有人少劳少得，少劳少得的人不看自己少劳，只看少得，感觉自己吃亏了，这也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如果收入分配的差距超过了一定限度，有可能影响效率，使一些人自暴自弃、消极怠工。所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必须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我们所理解的平等，一是生产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二是机会的均等，三是现有生产力水平上的按劳分配。我们所理解的效率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效率，机会均等下的效率，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效率。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才能妥善处理好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二) 从经济上看，市场调节虽然有局限性，但它毕竟能使经济在波动中增长。从社会协调方面看，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却要大得多。市场本身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协调。我们不是为增长而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是统一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政府调节，是因为有效率的政府调节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方面。它表现在社会方面，是指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进行收入分配的调节。这种调节是另外一种意义的调节，与调节供求平衡不同，它是从社会意义上讲的。这种调节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目标即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因为，在经济改革中应注意到，累进制的所得税和调节税以及对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补助，一方面要有适当的限度，另一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保证了社会协调。我们整个改革要沿着这样一种方向前进。

(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新的价值观念。比如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就业”？怎样看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切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通过思考，我们可以明辨经济改革中的对与错、是与非，了解到什么是我们要争取

的，什么是我们应该抛弃的。人们往往把不值得留恋的东西拼命地抱住不放，这就涉及到价值观念的转变。没有价值观念的转变，就不可能对经济改革做出正确的判断。

(四) 传统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家族观念和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二者是相冲突的。在传统东方文化基础上实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时时处处都会遇到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在传统东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中作出选择，而是探索如何在两者之外，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新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难题，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从这种意义上说，价值观念的转变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深刻的一场革命。这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艰巨性。

六、近期需要认真注意的问题

(一) 扩大经济中的横向联系是近期改革的重要措施。只有扩大横向经济联系，才能使我们的商品市场趋于统一，使我们的资金市场逐步形成，才能打破条块分割。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定不搞企业的横向经济联系，不让企业之间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互相协作交流，不让企业的产品打到对方的市场上去，那么，我们的市场机制是建立不了的，我们的条块分割是打不破的。这正是我们近期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正在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中前进，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扩大经济中的横向联系：这是改革在继续进行的证明。

(二) 我国经济当前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相形之下是次要的。这不是说消费基金不需要

调节，而是说不能把这一点提到最突出的地位。要知道，我国消费者手中之所以有货币，是由于他们提供了物质产品和劳务。收入是与供给相联系的。如果对消费基金有过多的限制，往往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也抑制了供给，从而给将来的经济发展造成后遗症。经济调节中，既要调节需求，也要调节供给。绝不能在压低需求的同时把供给也压下去了。我们认为，消费早熟需要避免，但不能认为我国目前已进入早熟型消费阶段。我们应该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防止早熟型消费的出现。早熟型消费有两个标志：一个是积累率过低，而我们的积累率保持在30%左右，是高水平的；另一个标志是稀缺生产资源中的大部分被新的消费方式所占用，比如石油，生活用油过多就会影响生产。我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目前没有早熟消费。

（三）平衡是一种分析方法，是分析的出发点，平衡本身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在运动过程中，总是围绕着平衡点摆动，在一定范围的摆动中前进。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不是为平衡而平衡。假定经济上不去，财政平衡是无意义的，信贷平衡也是无意义的。我们要认识到，同样是平衡，有低水平与高水平之分。做到低水平平衡并不难，只需采取紧缩政策。如果我们不单纯抑制需求，而设法刺激供给，那是高水平的平衡。何况，经济总是在围绕着一个平衡点上下波动中不断前进的，“需求略大于供给”和“供给略大于需求”，都是基本平衡。按我国目前的情况看，“需求略大于供给”更具有现实性，而“供给略大于需求”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当前必须学会如何适应这样的形势，学会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进行经济建设。

（四）政策要保持稳定和连续性。要让人们感到放心，让从事经济改革的人感到放心。政策的多变只会促使政策效力递减。